

不正确的。因此它是不科学的，它没有正确的反映出狼的生活。因此它给影片只能带来坏处，不能带来好处。”

这实在很形而上学，好像只要是狼，因为它的政治形象是凶残的，就只能表现它的凶残性，假如多方面地表现出狼的其他特性，那就是错误的，不光是政治错误，连生物学上也是错的。在这里，政治教条已经远远超过了科学实际。

这种片面强调政治性，简单化、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很快在对苏联模式顶礼膜拜的中国纪录片界形成风气。对后来的纪录片创作乃至观众观看的口味，都产生极大影响。因此，当我们的纪录片工作者试图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方式上做一些探索、拓展时，当我们的解说词写得不那么昂扬、坚定、强硬时，当我们的画面稍微有一些柔情流露时，连观众都会来信声讨，也就不足为奇了。

4、口述历史：重拍三大战役 ——吴本立访谈录

时间：2001年3月28日

地点：吴本立家

方方：您好！很不容易找到您。我想了解，作为《中国人民的胜利》中方总导演，您当时是怎样配合苏联专家拍摄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的？苏联专家是怎样要求你们的，你们是怎样拍的？

吴本立：据说，在我们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全国快解放时，斯大林曾建议拍摄一部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片子，经过毛主席的同意。后来从审查片子来看，证实这个“据说”是确凿的。因为，我们在莫斯科编辑这部《中国人民的胜利》时，是经过斯大林本人审查通过的。然后，导演啊、制片啊，我们一块把完成的片子拿到中国来。经过党中央、毛主席等领导的讨论审查，通过以后，再在全国放映的。

方方：毛主席亲自审查的？

吴本立：亲自审查。

方方：在哪儿审查？

吴本立：审查在羊市大街电影局，刚解放时，电影局局长是袁牧之。那个放映室不大，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的所有领导同志，几十个人，都来了，坐满了那个屋

子。我和苏联导演瓦尔拉莫夫在旁边站着。当时我们都很紧张，是不是能通过？是不是还要修改？他也很紧张，我也很紧张。我们俩站在旁边。苏联导演瓦尔拉莫夫



这个人挺好的。

方方：你们俩不坐吗？都站着啊？他们审查时你们俩就站着？

吴本立：我们那时候也不愿意坐，因为这是中央的领导人来审查片子，我们高兴极了。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袁牧之同志主持的。

这个片子拍摄，

他们从苏联到中国来也是比较仓促的。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典……

方方：对。这情况我知道的，开国大典的前一两天晚上，苏联摄影队就到了。

吴本立：噢，前一两天。但是我们摄制组早都成立了。《中国人民的胜利》我负责，《解放的中国》是徐肖冰负责。主要的成员，翻译、制片、摄影师都准备好了。他们（苏联人）一来就住在翠平庄。

方方：什么地方？

吴本立：西河沿，三点水沿途的沿。西河沿有个翠平庄。是那时内部的一个高级招待所。哈哈，那时候刚解放，其实挺简单的。先住在那个地方。把他们都安排好，导演很着急，因为很快就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们马上就要工作。在这个片子里，毛主席要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场面是很重要的。另外，还要军事检阅。当时第一步我跟他（苏联导演）商量，所有的苏联摄影师的摄影位置我都把它定下来了。主席台的、台下的、两边的，还有一些高地的，有苏联摄影师，也有我方的摄影师。他们要的材料事前我都研究好了，选哪些角度等等。因为我对整个的要拍的场面都比较熟悉。主席台上导演的位置我把它固定下来，另外有两个摄影师的位置我也把它固定下来。

我就在主席台前面，我可以跑来跑去比较方便。苏联同志想要跑来跑去，当时

我们的礼宾司不同意。

所以，我就有两重任务：一个是彩色片，一个是黑白片。黑白片主要是供国内放映用。

方方：苏联拍彩色片，我们拍黑白片？

吴本立：对。他们拍彩色片，我们拍黑白片。《中国人民的胜利》整个是彩色片。

方方：这我知道。我曾经听说过，开国大典的时候，好象是有好多片子烧掉了，还是弄丢了？

吴本立：没有。

方方：还听说毛主席讲话的声音因为话筒没有接好……

吴本立：没有，没有。那是整个一条拍下来的，这都是我布置的。

方方：那说明外面传说的不对。最近新影厂拍摄的大型彩色纪录片中还说，“这是苏联拍摄的彩色的《中国人民的胜利》，我们第一次用……”。

吴本立：不对，事实是我拍的镜头里面有主席从下面走上来一直走到主席台中间。我们早就拿到了彩色片，把彩色片整个地翻了个底，保存起来。

方方：噢，先把彩色片翻成黑白片。

吴本立：翻底，翻成底片。

方方：翻成黑白片的底片？

吴本立：对。

方方：然后就保存起来。放映用的是拷贝，拷贝是黑白的吗？

吴本立：不，拷贝都是彩色的，放映久了，颜色都褪了。

方方：噢，保存的是黑白的。

吴本立：《中国人民的胜利》保存的底片是黑白的，我们翻成一套黑白底片保存。他们给我们的拷贝不多，在全国一放映就完了。所以有一套黑白的完整的，长期保存在片库里。

方方：那我怎么听说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讲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个镜头实际上是另外的镜头接上去的？

吴本立：不是，不是。哈哈。

方方：那真是，必须您当事人来跟我们说说，这才最可靠，最准确。

吴本立：对，这事我最清楚。事实是，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是拍了整个的一条。

方方：全部的长镜头，整个的长镜头，一条下来的？

吴本立：对，一条下来的。

方方：一条大概有多长？多少分钟？

吴本立：千把尺。差不多就是三百多米。一条下来，我那时是用固定的机器拍的。

方方：一盘胶片有多长？

吴本立：整个的就一千尺，三百多米。

方方：噢，我懂了。就是整个一盘带子，就一个镜头，就对着毛主席拍的。那时是中景还是全景？是整个天安门的全景？

吴本立：是主席台的全景。

方方：主席台大概是：毛主席在中间，赛福鼎啊，宋庆龄啊就几个人？

吴本立：就是主席和副主席几位。

方方：啊，那镜头是很近的，了不起。而且同期声全部录下来了。

吴本立：对。这个天安门拍得还是比较完整的，包括检阅。中间插的呢，是后来剪辑的。剪辑的那些零散镜头都是我拍的。特写啊、近景啊，口形一对就行了。

方方：噢，我知道了。毛主席讲话的那一段镜头连焦距都不变地固定着拍摄。全是正面的？

吴本立：对。拍完了《开国大典》以后，要设计整个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设计的总负责是刘少奇同志。

方方：对，我看到过资料记载的。

吴本立：我的这部片子总负责是刘少奇同志，重大问题我都向他请示。在导演还没有设计之前，中央就定了由作战部的李涛作一个军事上的报告，让导演、摄影师和苏联同志都参加，我们的军事顾问是黄镇，后来是文化部部长。

方方：军事顾问是黄镇？不是“王胡子”（王震）？

吴本立：不是“王胡子”（咳嗽），黄镇在长征时是个小文化人，会画画。

方方：对，画了很多速写。我看到过。

吴本立：他跟我们跟了一年。作战部部长李涛作报告，大家听了，报告重点是解放战争的四大战役：东北的辽沈、平津、淮海、渡江。前边也讲了一些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我们的长征，遵义会议确定主席领导的正确路线，然后到延安，到了延安我们部队只有3万人，这些简单地讲了一下。重点还是讲四大战役。

然后，苏联导演，他也是搞战争片的，他就根据这些情况搞了一个拍摄提纲。那是俄文的，然后翻译过来。刘白羽是文学顾问，研究提纲时他都参加。我们也一

起参加研究，包括军事顾问啊，等等。

苏联导演拍摄提纲基本上是可以的。因为他是搞战争片的，对战争片的一般规律比较了解。有许多共同点。提纲就大体上定下来了。

那时候，国民党还有些残余，在西南。我们派了一些苏联摄影师、中国摄影师，跟着部队把消灭西南的残余国民党部队的情况拍下来。另外，还派了一些苏联摄影师和中国摄影师一起到延安等老根据地，党中央的地方，拍了一些镜头。

重点还是四大战役。四大战役的拍摄，按照季节表进行拍摄。

首先拍渡江战役，因为秋天看上去和渡江时的气候差不多。

方方：真实的渡江战役是在三、四月？

吴本立：对，到了秋天，先拍渡江。渡江是在镇江那一带地方补拍的。实际上我们所有的材料都是补拍的，都是按原来战争的真实情况把它概括的，选择它主要的内容。

方方：那么，船啊，部队啊，都是重新组织的？

吴本立：部队基本上是原来的部队。

方方：国民党部队呢，谁来扮演呢？

吴本立：我们自己部队。拍摄时就按照当时渡江的情况，前前后后，从动员，一直到后来打到南京、上海，基本上都按原来的样子拍的。我跟部队一直打到上海。

方方：吴老师，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镜头，就是解放军冲进总统府，把那个青天白日旗子弄下来。

吴本立：哈哈，那是我们《中国人民的胜利》拍的，不是在《百万雄师下江南》。

方方：不是当时你的九个摄影队拍的。

吴本立：噢。是后来有苏联摄影师参加的，由我们的摄影师与苏联摄影师共同拍摄的。

方方：这都是有安排的？上去，镜头摇上去，然后把旗子扔下来？

吴本立：对对对。那是事先安排的，设计的。

方方：哪一个战士上去扔这个旗子？是不是派一个特别优秀的战士？

吴本立：那当然要选择。

方方：选择一个立过功的？

吴本立：在部队里拍摄……

方方：很讲究的。

吴本立：拍摄对鼓舞士气很起作用的，上镜头的都是受过部队表扬的、立过功

的优秀战士。

方方：那两个战士，扔旗子的，你还有印象吗？

吴本立：记不得了。那时候我在上海，我不在南京。这些镜头是很不错的。

方方：拍“总统府”，我感觉有点用轨道车的感觉。

吴本立：不是。《中国人民的胜利》用移动车。一直走，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

方方：移动车是什么样的？是机器下面有轮子的？

吴本立：有轮子的。有轮子的车子只要地面弄平了，就可以一直推到里头去。要铺铁轨，不可能拍那么长。所以，那个镜头是比较好的，苏联同志一起设计的。

方方：《百万雄师下江南》中没有打“总统府”的镜头啊？您有没有拍？

吴本立：拍是拍了。（咳嗽）拍了一些另外的镜头，蒋介石的办公室啊，总统府里头的一些设施啊，等等。

方方：一般是扛着拍的？不那么平稳的？

吴本立：对。

方方：也有一些固定的镜头？

吴本立：对，固定的比较多。

方方：当时你们拍《百万雄师下江南》有很多是在晚上的，都能拍出来吗？

吴本立：我们的部队晚上的作战都没有办法拍，因为不可能有一点点光，会被敌人发现目标。一般来说，在部队拍摄我们作战都是拂晓，天刚亮，或者天还没有黑。我们作战一般夜间作战比较多，因为我们的武器装备都要比对方弱，对方都是美式装备啊，夜战对我们有利。我们地形也熟悉。后来渡江情况就不一样了，排山倒海，白天晚上不管了，白天向对岸开去，还同时配合炮战。

方方：真正渡江时是在白天？

吴本立：白天渡。我们的大炮先把敌人的火力压倒，整个沿岸都是炮兵。选择敌人的薄弱地段，我们白天渡江，一上岸就好办了。

方方：那您也在船上拍？

吴本立：都在船上拍。所有摄影队都在船上，船上是这样：先动员。部队里作战都有规定：动员，领导人讲话，宣传鼓动，然后做准备工作，都是要隐蔽的，而且我们都用了民工、勇敢青年，水性都比较熟的。一开始我们把渡江拍了，弄完以后搞淮海。

方方：淮海战役就比较好拍了？

吴本立：也不好拍。它那个战场是大平原。二野打援，打黄维兵团。黄维兵团

是美式装备，有几十万部队，基本上都是层层包围的办法。

方方：那么象抓住杜聿明等军官这些镜头怎么拍？

吴本立：这是在现场拍的。

方方：现场拍，那么把他们从战俘营里再叫出来拍？

吴本立：俘虏了以后……（咳嗽）

方方：杜聿明愿意配合？

吴本立：不是愿意，就叫他出来走一走，国民党部队里谁是当官的谁是当兵的，一看手就知道了。

方方：手粗糙的就是当兵的。

吴本立：噢。当兵的手都是粗糙的，当官的手肉呼呼的，很好区别。我们把手粗糙的排在一边，把手肉呼呼的排在另一边。从俘虏里很好区别出来。

在东北拍辽沈战役，国民党司令员叫什么名字的，关在抚顺我们一个高级的俘虏营，我就到那儿去拍。叫他出来走一趟，我就拍几个镜头，他是我们打锦州以后俘虏的。

方方：那苏联专家拍的时候，是否再重新拍？

吴本立：这些都不拍，把它调（指有关镜头）出来。

方方：那么苏联专家的彩色片怎么拍？

吴本立：彩色片是我去拍的。

方方：噢，还是您去拍的。

吴本立：我去拍的。实际上我负责全片，还兼摄影。

方方：就是说，叫杜聿明他们出来走一趟，也是你去拍的。

吴本立：对，都是我们摄影队拍的。

方方：我们看到的镜头，他们有的从坦克里走出来啊什么的。

吴本立：对。那个黄维吧，他穿着士兵服躲在坦克里头，被我们抓住了。当时我们部队把敌人包围以后，放了一个口子，让他们出来，似乎是“突围”吧，哈哈，他们一出来，出来一个抓一个，就这样。那是二月份，刘邓大军打的。

方方：那个穿着士兵服躲在坦克里的镜头，您后来彩色片重拍了没有？

吴本立：没有。没有拍，那个拍了俘虏就行了。

方方：不重拍那时那个场景了。

吴本立：对。

方方：苏联专家也没提出来要拍当时的场景？

吴本立：对。我们那时从大的方面来拍。那些细节也伤害人。已经拍了他被俘虏了，你再叫他重新来一次，不太合适。我们都没有提出要拍这些。

方方：因为我觉得苏联拍片子蛮喜欢这样做的。

吴本立：苏联的这个导演，我觉得他在军事上是比较内行的，考虑怎么做，他担心敌人的威力，比如拍炮兵的时候，他原来提出采用密集排炮。后来，我不同意，我说在现场，尤其我们的炮兵不是那么很多，而且我们的炮一旦被敌人发现，实际上是很吃亏的。我当时就向他解释，他后来还是接受了我的意见，炮火不要过于太密集，但是拍电影，排炮当然好看得多了。

方方：那些炮是真炮还是后来经常采用的焰火？

吴本立：都是真炮，是实弹。

方方：那是花钱花得厉害啦！

吴本立：啊，我跟你讲，这个花钱花得我竟然流眼泪了……

方方：噢，是因为当时还刚刚解放，挺心疼的。

吴本立：对。

方方：但是是苏联专家在指挥。

吴本立：那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两国领袖都同意了。

方方：您能讲讲印象最深的吗？

吴本立：那就是，一个是四野，一个是三野。在四野拍完以后，我看过一个报销单子，（沉思很久）是花了五百多万哪，看了这个单子，我就……

方方：我看过你们的回忆录，真是很不容易，你们胶卷都是一尺一尺数的，跑到外面还要借。那个报销单子只是你们自己的用途吧，象那些炮弹啊什么的，不会到你们这儿来报销吧？

吴本立：一起算的，部队当然要算的。后勤部，整个儿要算的。

方方：过去部队拍片，还会算这种钱啊？

吴本立：是专门为《中国人民的胜利》这部片子的呀。

方方：是啊，是啊，也要算吗？

吴本立：也算。

方方：那这笔钱谁付呢？

吴本立：国家。

方方：国家？哪里付呢？

吴本立：四野用的，四野付嘛。每个野战军所用的钱归那个野战军付。我在拍

东北的战役时，花的钱最多。三大战役最大的战场是辽沈，敌人最后被我们全部歼灭了。我们打锦州的时候，牺牲了三个摄影师。

方方：我看到材料了，都是很好的人。

吴本立：锦州是我亲自参加拍摄的。在去东北重拍片子时，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给林彪，让我跟刘白羽去见他，把同苏联拍片的情况讲了，请他考虑拍东北的战役重点放在哪几个地方。主席亲自写了一封信。

方方：那时候林彪还在东北吗？

吴本立：不，不在。他在武汉。那时候他的部队快打到海南了。他的指挥部在武汉。我们到武汉见了他，当面谈了一下。他同意拍，让他们后勤部长陈沂来总负责，耳东陈、三点水一个斤字。

方方：那就是后来上海的市委宣传部长喽。

吴本立：噢，对。就是他，当时是后勤部长。他总负责。那时候我们关系都挺好的，经常碰在一起。还有作战处处长，哎呀，这个名字我突然忘了。

方方：没关系，没关系有资料记载的。那时候林彪说话很干练的，还是慢吞吞的？

吴本立：慢。他讲话的特征就是慢吞吞的。当然，我们跟他谈话也不是很多。他看了主席的信，他知道了。

方方：噢，主席的信，主席的亲笔信是叫你们带过去的？

吴本立：我们带去的。

方方：拿在手里的？

吴本立：拿在手里的。

方方：噢，蛮好复印一份留下来。

吴本立：不敢。

方方：原文您还记得吗？

吴本立：毛主席的信我们都没有看，就直接给了他。

方方：封好的喽？

吴本立：封好的。部队的习惯。他看了信以后，很高兴，说：“好啊！我派几个得力干部，帮助你们来完成这个任务吧！这个事好得很。”他就把原来那些主要部队调过去，锦州战役、辽沈战役、狙击战的一些部队……

方方：都是原配的？

吴本立：都是原配的。还有坦克师，整个坦克师啊，用列车装运过去。

方 方：那他打海南怎么办？

吴本立：打海南还有部队啊。这些部队都在天津。四野的好多部队都留在天津了，天津打完了留下来的。我拍的坦克师，上火车，哈哈，那不错。东北战场拍得很不错。

当时两大任务：一个是东北，一个是平津。平津也是主要四野打的，谈判也都是四野。

方 方：有一个北京的“入城式”，也重拍？

吴本立：对，是重拍的。

方 方：那怎么拍？毛主席也来帮你们重拍？

吴本立：毛主席没有参加。林彪来的。还有政委，罗荣桓和部队其他一些高级干部。我在城楼上，拍他们。检阅在前门，前门的彩色片都是我拍的。所以老百姓感到奇怪：怎么北京搞第二次入城式？哈哈。

方 方：我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说什么第二次入城式的时候，老百姓都是冷冷淡淡的。

吴本立：没有。

方 方：也是很热烈的？

吴本立：对，很热烈。很热闹，两边站着。

方 方：都是重新组织的？

吴本立：动员的。动员来拍彩色片的。事先经过街道动员，挺热闹的。那个场面还是挺红火的。

方 方：那么就是说，毛主席不出现，就是林彪，和他政委，四野的人。

吴本立：对，四野的人。因为表现部队入城式。

方 方：老百姓都是街道组织的？

吴本立：都是街道组织的。

方 方：第一次入城式是自发的，还是组织的？我是指你那时候真正跟着部队时。

吴本立：第一次我不在，我不在北京。

方 方：那次入城式是谁拍的？

吴本立：我不知道。我拍的这一次是组织的。这个片子整个拍完了是1950年，大概。

方 方：没关系，这个能查到，这些都有记载。

吴本立：拍完了以后，我们到莫斯科去制作。

方方：那时候用什么胶卷？

吴本立：苏联的，彩色胶卷。有爱姆的，有用大机器的，我都是用小机器拍的，爱姆的。

方方：爱姆，伊文思送给我们的是不是爱姆的？

吴本立：不是。那时爱姆多了，三个头的，四个头的，有长镜头、短镜头的、有广角。美国的。我们在东北接收了的。

方方：对，他们所有的东西。

吴本立：还有写字台。

方方：搬空了，我知道。

吴本立：全部搬到兴山去。

方方：后来接收大员金山到了“满映”吓一大跳，说“你们怎么连一呎胶片都没有给我留下”哈哈……

吴本立：哈哈，连一个灯泡也没有留。

方方：在苏联洗印以后，就配解说词吗？

吴本立：影片制作全部在苏联，大概一个多月，剪辑。

方方：剪辑由谁剪呢？

吴本立：我们同苏联导演一块剪辑。放出来看看，路子对不对，画面好不好，都互相商量，挺好的。工作很认真。

方方：刘白羽是后来过来写解说词的？

吴本立：一块儿写的。是这样的：解说词是苏联的西蒙诺夫写的。

方方：西蒙诺夫写的。《日日夜夜》的作者，大作家。

吴本立：那个解说词写得真好！我当时看了翻译过来的，很感动。刘白羽根据这个解说词来修饰、中国化。

方方：先翻译过来，然后刘白羽再整理。

吴本立：他变动也不大。因为翻过来的文字就非常好。那个西蒙诺夫感情丰富。刘白羽把有些词改一个字。

方方：更准确一点。

吴本立：解说词我非常欣赏。真了不起。他（西蒙诺夫）来中国只走了一趟，采访了一下，到部队去采访。

方方：这几个战役他去看了一下？

吴本立：地方他都去了。还看了我们拍的一些战争片子，《百万雄师下江南》等等。

方方：就是您原来拍的。

吴本立：对，就是我原来拍的。东北的，东北三联把这些片子都给他看了。看了以后，他又作了采访，时间不是很长，就回去了。他有个秘书，秘书带着一架打字机，他提问，人家回答时，秘书就打下来了。他把打好的采访材料都带去，回去考虑好久，真正写，我听说就花了三天三夜。啊呀，当时我听了他写的解说词，特别欣赏，那水平确实高。一个外国人来反映你一个国家的革命战争，几十年的历程：从与国民党第一次合作，一直到解放战争的胜利，漫长的革命岁月，他通过这部片子来概括地写出这样的解说词，是很感人的。我们直接搞电影的都觉得感受很深，一般观众更会受感动。

解说的那个人也与我一起去了苏联。是原来在上海电视台干过的，上海电视台的头头。

方方：那我能查到。

吴本立：这个片子的解说词都有。

方方：解说词发表过吗？

吴本立：解说词单独发表过。我记不得发表在哪里。我觉得就是解说的人稍微差了一点。

方方：声音太——

吴本立：声音要诗情画意、感情丰富一些才好。这是诗人写的啊！就差这么一点儿。哈哈。

解说词、音乐完全弄好以后，我在现场拉的红灯。

方方：怎么“拉红灯”？

吴本立：制作中国拷贝，用中国语言，配哪些时候该说，哪些不该说。红绿灯嘛。

方方：就是说，也做了一个俄文版的？

吴本立：俄文版、中文版都做了。

这个片子完成了以后，还要等斯大林亲自看，看完通过了以后，才能出。所以我们在那儿等了有个把礼拜。个把礼拜以后，导演很高兴地来对我说：斯大林已经看过了，通过了！有可能还要接见。当时是准备接见的。后来接见的那一天他有事，海军的什么纪念活动，他要出场，他要去。这一天就不行了，要改期，而我们要赶

快准备回国，因为时间再晚了不好。导演就和我们商量，赶快走，坐火车，从苏联回来一个礼拜。去也是一个礼拜。

方 方：莫斯科到北京。

吴本立：对。回国以后，然后到几月份……

方 方：这个日期可以查。然后就是毛主席……

吴本立：毛主席审查。

方 方：刚才我没听清楚，电影局在羊市大街？

吴本立：羊，市，市场的市，羊市大街多少号我现在记不清了，它是在原来一所中学的对面。那个地方并不大，现在大概都住人了，成宿舍了。那个地方长条形的，过街的，这边一条街，通过那边一条街，挺长的。整个电影局都在里头，行政处啊，什么处啊，当时有个小放映室。中央的所有的重要的领导人都来了。后来我们想想真有点担心：中央那么多领导人，都到那个地方。那时刚解放不久……

方 方：那倒是蛮危险的。

吴本立：那天是晚上，我和那位苏联导演都站在旁边。心里在嘀咕：能不能顺利通过？要修改我们还得往哪儿跑。看完了，主席讲话，他说：“很好，通过！”

方 方：哈哈。

吴本立：大家鼓掌。

方 方：这时候林彪在吗？

吴本立：林彪不在。有刘少奇、周总理、朱老总，等等。还有杨尚昆，那时候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吧。看了以后，少奇同志就跟我、跟那位苏联导演握手，表示祝贺。嘿嘿，他们走了以后，我们两个人还拥抱，哈哈，真高兴啊！后来我们到旅馆聊天，兴奋得不得了。

方 方：到哪里去聊天？

吴本立：旅馆里。

[电话铃响。录音机关断]

方 方：您是哪年出生的？

吴本立：我1919年阴历五月十四生的。

方 方：哪里人？

吴本立：安徽怀宁，原来是安庆。安庆原来是省会，后来挪到合肥去了。

方 方：吴老师，您是怎么参加延安电影团的？

吴本立：说来话长。

（由于录音机故障，关于本人经历部分，经吴本立本人同意，摘录吴本立提供的2000年7月住积水潭医院时写作《从旧社会奔赴革命圣地延安》部分章节。）

1936年春天，我还在南京金陵兵工厂子弹厂做工，每天上工八小时给三角钱，晚上加班四小时，给一角五分钱。每天要搬几十筐弹头、弹壳，累得腰酸腿疼。听说南京中央电影摄影场招考放映电影训练班，我冒着被兵工厂开除的危险，去报名参加考试。经过面试后被录取。在放映训练班学习三个月，另行分配。学习了放映机、发电机原理，和放映的实际操作。学习三个月后，实习一个月，根据成绩根据实习生学习成绩等待分配。1936年夏末，我接到电影场的通知，让我到厂里保管处报到，担任放映员助理。我的师傅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姓王，上海人，对我非常和气，教我很多技术。使我在几个月里就成为比较熟练的放映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八·一三日本军队攻占上海。南京国民党机关迁移武汉，电影场部分人员、器材乘船运到安徽芜湖。我随保管组人员与电影器材到了芜湖。这时新闻摄影制作人员仍旧在南京。

我到芜湖不到一个月，一位技术科长通知我，说上面决定要我当新闻摄影助理，要我立即带上随身行李去南京。我当即整装赶赴南京，找到新闻片组负责人，经他介绍给姓汪的摄影师担任助理工作。这时已进入秋天了，我们的拍摄点是西北。我们立即乘火车到西安，在火车上摄影师教我装片、倒片、我们使用的摄影机是美国三个镜头的埃摩，倒片机是小型手摇机，这两项工作比较简单，在火车上我不断地练习，也就很快地掌握了。

到达西安后，汪摄影师一个人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宣传部联系工作，回到住处时只简单向我说，过一两天就出发，参加陕西省组织的各界人士慰问团，去陕西省黄河沿线慰问军队，要我做好擦拭机器，倒好影片等准备工作。

随慰问团出发时，我才知道慰问团的具体组成人员，有国民党省党部宣传人员，工商界代表、妇女联合会代表、还有山西联合大学青年学生代表。在沿途从表面上看，这个代表团青年妇女和大学生是比较进步的，他们在沿途中写标语，宣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等等。其中有些青年人看到我做摄影助理工作很辛苦，每到一工作地点，总是搬行李，背机器；摄影师拍电影时，既要背机器、装片，还要写场记，多半都是干劳动活。他们很同情我，经常帮助我拿东西。

在拍摄各界代表慰问部队的同时，摄影师还拍摄了国民党正规军队的作战演习，有步兵、炮兵、坦克在野外联合实弹演习，前线指挥部以及高级指挥官视察阵地，等等。后来新闻组把这部分材料，当作在前线与敌人作战来使用。

慰问团工作结束之时，已是秋冬时节，我们在西安休息一段时间，然后经潼关过黄河，到风陵渡。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黄河。黄河水激流汹涌，风浪很大，我们坐的木船载满了乘客，在划船船工的喊号声中惊心动魄地到达对岸。再从风陵渡乘火车去太原。

车站上很混乱，车厢里拥挤不堪，我好不容易才抢到一个位子，让给摄影师坐，我只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火车行驶得很慢，情况好的时候，一小时可以开30公里，但停下来就没有准了。其实这里离前线是很远的，主要是车站管理极混乱。记不清多少天后才到达临汾，听说太原周围在激战，摄影师告诉我下车住下再说。

临汾是个小县城，虽然这里的战争气氛很浓，但商店照样开业。国民党的伤兵很多，经常不给钱，或者少给钱，老百姓只能在背后骂几句了事。在临汾住了好几天，我无事可做，在书摊上买些报纸杂志消磨时间。其中有份《解放》杂志，里面报导了八路军游击队在敌后英勇作战，攻占了敌人据点的事情。

汪摄影师听说太原处于紧急状态，临汾离沦陷不远了，不得不去采访八路军驻临汾办事处。当时办事处赵品三主任接待我们，谈了八路军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情况。汪摄影师问能不能去拍八路军与敌人作战的电影，赵品三主任恳切的回答：“你们要拍八路军与敌人作战的材料，比较困难，要通过敌人层层封锁线，安全问题没有保障。在临汾郊区有个八路军游击队训练班，是培养对敌斗争人员的，你们是否可以到那里去拍些影片。”汪摄影师说：“我们回去再研究一下。”

经过几天的思考，汪摄影师把我叫到他住的房间里说：“最近我身体不好，八路军这部分材料你去拍好了。”

我当时说，我当助手到现在，你都没有教过我技术，怎么一下放手要我自己拍？于是汪摄影师当天晚上把摄影技术和创作上的关键和这次拍摄的要求教了我一遍。其实从我跟他当助理以来，他所拍的材料、光圈的应用、摄影技巧、每个小主题所拍的数量、以及每个镜头的长短，我都记住了，每拍完一个材料，我回到住处都详细的追写笔记。可以说我一直在偷偷地学，对这次的拍摄我还是有把握的。

第二天，我背上摄影机、三角架和胶片，去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赵品三主任。他说你们那位汪摄影师怎么没有来，我说他身体不好，要我来拍。于是赵主任写了一张便条，派一位年轻的通讯员，陪同我去游击队训练班。

我们步行了十几里路。到达训练班办公室，就在一个村庄里，屋子不大，顶多是十几个平方米，陈设很简单，一张长条桌，四周都是长条凳子，桌上放着一个有灯罩的油灯。不一会，来了两位穿灰军服的男女，看上去不过三十几岁的样子。我

当时不知该怎么称呼他们，通讯员介绍说，这就是训练班的负责人，男的是彭雪枫队长，就是后来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女的是李伯钊，杨尚昆同志的夫人，红军长征时就搞宣传工作的。

我请他们把训练班的性质和情况做一个全面介绍，最好给我一份拍摄提纲。李伯钊很懂艺术，第二天下午，两位队长就和我谈了拍摄计划：

1. 来自全国各地的男女青年到达游击队训练班，几百个男女学员都分散在周围的村子里，与老百姓相处得很好；2. 清晨吹号起床集合，集体队前点名；队长简短讲话，集体早操，解散后洗脸、漱口、吃早饭；3. 野外集体上各种课程；4. 课外活动游戏、阅读、篮排球运动；5. 军事训练，包括野外演习。

我完全同意他们谈的拍摄内容。提出集中三天时间拍摄完。

拍摄时已是寒冷的冬天，所有的活动都在室外，条件很艰苦，但是学员服从命令听指挥，非常配合。两位队长始终陪同拍摄，平等待人，考虑问题比我还周到，我工作得很愉快。

回到临汾住处，我把在八路军游击队拍摄的情况，如实向摄影师汇报，他当时表示满意。我将已拍好的1500呎胶片，整理好放在两个铁盒里，同时把场记也放进盒子里，剩下的500呎胶片还给摄影师。他当时告诉我，据说太原已失守，这里败下来的兵很多，大部分商店也关门了，我们明天就走，晚上把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好。

我们颠簸流离10多天才回到西安。到达西安的第二天，就把所有拍好的胶片寄回重庆。我们则在西安待命。一天汪摄影师忽然接到厂里来的电报，要调我回去，电报很简短，没有说明任何原因。我以为是调我到别的摄制组工作，匆匆忙忙往回赶。一到重庆就直接到南岸的摄影场新闻片组报到，组长什么也没说，只通知我说，场里决定调你去音响室当录音助理。我觉得很奇怪。后来在场里听到风言，说吴本立去西北一趟，颜色变红了，不能让他拍片。但是他们又不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当时国共合作抗日，怕声张出去对电影厂不利。

我的好朋友程宏济很为我抱不平，他当时是编导助理，就让我去他工作的新闻片摄制组作音响录音。程宏济很有文学才能，在拍摄新闻片的采访中经常记下素材，然后写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程宏济的妹妹在延安，我同他谈起了我和八路军交往的感受和在西安读到斯诺写红军长征的书的内容，我们俩都有了投奔延安的念头。程宏济妹妹黄铁从延安来信，告诉我们她在抗大学习的情况，更促进我们奔赴延安的决心。

为了不被人家发现，我们就到外面租房子，不在宿舍里住，这样可以商量事情，

行动也比较方便。

程宏济写信给他父亲的学生，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夏子栩，程宏济的父亲是被国民党杀害的革命烈士。时隔不久夏子栩就给了回信，介绍我们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我们非常兴奋地立即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主任周贻接待了我们。

方方：周贻是哪两个字？

吴本立：圈吉周，贻是贝字旁一个台字。周贻主任对我们表示热情欢迎，说当时路上不好走，需要等一等，过一两周以后再回来。

我们正好乘这一两周的时间筹划护照和路费问题。我提出向厂里借三个月的工资，就说家里来了人，需要安家费。我们先后写了申请报告，财务科长很帮忙，批准各借150元。

还有一个大问题是护照问题。程宏济听说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陈晨最近要去西北电影公司，根据多次接触，觉得陈晨是比较进步的，可以让他知道真相，于是我们俩一起去他家拜访，希望他能帮助解决我们的护照问题，陈晨热情爽快地说，没有问题，我带的是中制的军队的护照，上面写的是一人，再加两横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过一段时间，我们俩又去了八路军办事处，告诉我们现在路上可以走了，不过你们行李带得简单些，路上什么也不能带，书或者其他有痕迹的东西都可能暴露你们的身份。我们只好把所有的东西都扔掉，我拍的很多照片全都扔掉了。

周贻主任给我们写了封介绍信，带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那个信有多大呢？大概有这么一寸大。（比划着）

方方：大姆指这么大。

吴本立：一个小条，介绍到西安办事处吴永福。上面写着：“永福同志，兹介绍程宏济、吴本立两同志去延安，请予办理。”很小的几个字。

周贻嘱咐我们，“动身之前把衬衣袖口处拆开，把这封信缝在里面，路上检查就不可能发现。不过路上还是要特别小心。”

拿到信的当天，我们就去了陈晨家里，确定了出发点时间，请他统一买去成都的车票。为了怕走露风声。我们在走之前的一周，白天照常在南岸电影摄影场里上班，晚上等人们睡觉以后才整理东西，每天整理一部分，带不了的东西，悄悄送给房东。临走前我们给厂里的负责人写了封信，说我们俩去武汉，自愿参加保卫大武汉的工作，信封好后交给房东，告诉他等我们离开10天后，请他把这封信送到电影场传达室。我们多付一个月的房租给房东。我们在半夜12点夜深人静的时候出发，

渡江到北岸，第二天早晨与陈晨会合，坐汽车去成都。

那时车票买不到，要等几天。我们就在陈晨的亲戚家里住了几天。从成都到西安的川陕公路，沿途检查很严，每到一个小城镇，都要下车检查，还常常要检查所有人携带的行李。遇到检查时，都是由陈晨出面，他拿着护照给检查人看，他们也查不出什么，只好放行。就这样汽车走走停停化了一个多星期才到达西安。

到了西安，松了口气，我们和陈晨告别，两个人叫了一个车，把行李啊什么都放上，那个时候是黄包车，没有汽车。然后直接到办事处。到办事处，我向他们借剪刀，拆开袖口把介绍信给他们看，他们带我们见吴永福主任。吴主任看了介绍信，和我们亲切握手，欢迎我们，说路上辛苦了，叫我们在招待所好好休息几天，还告诉我们：没事不要出去，上街必须要二、三个人一起，不要跑远了。

我们到了在办事处后院的招待所，首先换衣服，换上八路军的衣服，衣服、领章都有了。那当然高兴了。我们两个都换了衣服，至少在门口可以看看了，哈哈。

在那里呆了不久，大概快到10月下旬吧，招待所全国各地来的青年越来越多，办事处把我们去延安的人编成一个大队，大约有一百多人，像部队一样编成班，十几个班，有打前站的。就这样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男女在大队长的领导下，浩浩荡荡的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在路上走了好几天。

程宏济到达延安后改名黄钢。他后来当作家，出了好多书，写文章。他第一篇文章是《开麦拉前的汪精卫》，在延安写的。

方 方：是你提供给他的？

吴本立：不是，是他自己写的。在抗大我读了好多学校，抗大工人学校、华北联大、工人部。

方 方：您那时候到临汾拍的八路军的片子后来还有吗？

吴本立：没有了。

方 方：后来做过一个彭雪枫军长的追悼会的纪录片，那是上海的薛伯青拍的。其实你拍的要比那个要早十年了吧？拍彭雪枫已经是四几年了。

吴本立：那个资料都已经销毁了。

方 方：人家想想你怎么那么大胆子，用国民党的设备，把共产党的政策啊，思想啊，全部地宣传了一下，啊？

吴本立：哈哈。

方 方：现在算您革命经历从什么时候算起？是三八年还是三七年，还是更早？

吴本立：算一九三八年。以前不算。那时自己思想是进步的，但没有一个组织。

方 方：我还有一些问题。现在还没有《中国人民的胜利》完整的片子？

吴本立：有啊。

方 方：在新影厂吧？就是没有做成盘片。

吴本立：那时候翻成黑白片，整个的黑白片完整地保存着。《中国人民的胜利》，上次电视台来拍我，他们找了好多片子，好多，我拍的宋庆龄、我拍的主席一九四九年到天安门城楼上的镜头，他们都找到了。都插在里头了。

方 方：我很想看看完整的《中国人民的胜利》这部片子。现在能看到的片子都是被剪来剪去的，根本不知道哪一段出自哪个纪录片，究竟从哪里来的，原本是怎么样的。还有《解放了的中国》。

吴本立：完整的《解放了的中国》有黑白的，那些彩色的没有了。

方 方：我就想看一个完整的。

吴本立：我有一个《百万雄师下江南》录像带。质量不是很好。

方 方：质量再不行，总比看不到好。

吴本立：我拍了三十多部片子。《欢庆十年》，还有《苏联芭蕾舞艺术》，有比较完整的关于苏联芭蕾舞大师叫什么的。

方 方：乌兰诺娃。

方 方：这些片子你自己手里没有？

吴本立：没有。

方 方：我曾经看过你们老同志编写的《我们的足迹》，这本书的上本，您有吗？

吴本立：有。上本、下本都有。

方 方：我只有下本。您能把上本借给我用一下吗？用后还给您。

吴本立：可以。（起身从里屋拿来书）我这本是文化大革命抄家时候抄走的，平反以后才还给我，你看上面刘少奇的像上都打了叉，是造反派打的。

方 方：这是很珍贵的文物了，我一定好好保存，看完后我自己送来还您！

吴本立：这是我的几部片子的录像带，很不容易拷贝来的，你先拿去看吧。

方 方：好的，谢谢，我会认真去看的，看后一定完璧归赵，另外，我会再刻录一张光盘送给您。